

第四届“卿云杯”全国通识课程论文大赛

封面样张

| | | | |
|------|--|------|------|
| 学校 | 北京师范大学 | 院系 | 历史学院 |
| 专业 | 历史学 | 姓名 | 乌恩宇 |
| 年级 | 2021 级 | 任课教师 | 王鼎 |
| 课程名称 | 日本社会与文化 | | |
| 论文题目 | 走出天下：从《申报》对日君主称谓看近代东亚格局嬗变 (1872-1949) | | |

一、参赛范围

2023 年春季学期至 2023 年秋季学期，全国高校学生修读通识课程撰写的课程论文，或在讨论稿、读书报告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论文。

二、写作要求

- (一) 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晰的论证思路，充分的征引（文献、数据等）材料；
- (二) 文笔流畅，逻辑严密，结论明确；
- (三) 体现通识课程的能力诉求：反思能力、学术视野、贯通能力、学术想象力、学术表述能力等；能够体现对重要议题的分析和论证，对关键文本义理的解释和阐发。推荐进行跨学科的写作。
- (四) 正文字数一般在 5000 字以内（至多不超过 8000 字），须使用中文写作。课程论文应包括论文题目、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如有引文，须注明出处。文章按 word 格式 A4 纸（“页面设置”按 word 默认值）编排，提交电子版。字体：宋体；字号：小四号；字符间距：标准；行距：20 磅。具体格式参加附件 2。

走出天下：从《申报》对日君主称谓看近代东亚格局嬗变 (1872-1949)

摘要：近代以降，随着中日国势的此消彼长与时局背景的不断演变，《申报》对日君主称谓历经变化。从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使用日语中“帝”一词的音译“密楷度”（みかど/Mikado），到甲午战争中凸显民族意识的“倭主”，再到历时最久、使用最广的“日皇”，《申报》不同的对日君主称谓从侧面反映了近代东亚国际格局“走出天下”的时代印记，也凸显出日本近代化过程中“近代性”的缺失与错位。

关键词：《申报》；对日君主称谓；日本天皇；近代东亚格局

古今中国对日本君主的称谓不尽相同。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当代中国一般直接依汉字使用“日本天皇”的称呼；但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的古代中国和以之为核心的东亚世界秩序中，^②日本从公元 7 世纪圣德太子时代开始使用的“天皇”称谓^③显然是一种逾矩的僭越。作为统驭四海的天下共主，中国古代皇帝往往照例称日本君主为“日本国王”，社会交往亦多因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中期。近代以降，随着传统天下秩序的瓦解和中日关系的不断演变，中国官方、社会乃至个人对日本君主的称谓都有了相应的变化。作为“上可以闻国政、下可以听民声”的近代化媒介，新闻报刊对日本君主的称谓既能反映出彼时中日关系发展的态势，也能体现出社会舆论的对日态度，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然而，以往学界对此关注并不多。^④因此，本文试以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申报》1872 至 1949 年间的对日君主称谓为线索，探讨近代东亚国际格局的嬗变及其内涵，进而藉此省思日本近代化过程的历史局限。

一、“密楷度”：天下剧变与早期维新思潮的先声

19 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两个东亚古国先后在西方国家的炮舰之下被迫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但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在日本，经过“尊王攘夷”的倒幕运动，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落下帷幕，年轻的明治天皇于登基伊始便宣告了带领日本

①祝敏彻等：《诗经译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478 页。

②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4 页。

③高宝兴：《日本天皇的称谓》，《日语知识》，2003 年第 11 期，第 38 页。

④笔者尚未发现以近代报刊的对日君主称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但是，有许多研究关注到了近代报刊中与日本相关的信息并作了讨论，其中较近者如赵琦：《〈申报〉“长崎事件”报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23 年）；石汝：《〈北洋官报〉日俄战争报道中的日本形象》（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 年）等。

走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而在中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尽管不同阶层不断努力进行救国救民的种种尝试，但仍难以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到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尽管中国似乎进入了“同光中兴”的安定局面，但随着改革措施日见成效，此时的日本已越来越在东亚国际事务中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扩张姿态，而中国则不得不处于愈发被动的境遇。

《申报》正于 1872 年创办于这样的背景下。开办之初，《申报》多因袭传统，在报道中称呼日本君主为“日本国王”，所报内容涵盖日本内政外交，尤对涉华问题表现出格外关心。如对 1872 年 11 月琉球在其商人被台湾民众杀害后“差使往见日本国王”一事，《申报》便称“琉球一国为中国附庸，且台湾又为中国疆土，使果该国人民惨罹不测，自当奏闻中国、灭此朝食，胡为舍近图远，而乞拯于日本国君”，认为“此事实有不可解者”，表现出对当时琉球亲近日本、疏远中国情形的高度警惕。^①从 1878 年开始，《申报》首次出现了以“密楷度”一词称呼日本君主的情况。所谓“密楷度”，实为日语中“帝”（みかど/Mikado）一词的音译。尽管这一阶段《申报》对日本君主的称谓还有日王、日主乃至日皇等词，“密楷度”的整体使用频率也并不高，但该词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具有独特分析价值。

表 1 《申报》中“密楷度”一词出现情况统计

| 报道标题 | 报道日期 | 内容主题 |
|------------|------------------|------|
| 《延接秘鲁使臣》 | 1878 年 7 月 20 日 | 日本外交 |
| 《日本验船》 | 1878 年 7 月 30 日 | 日本军事 |
| 《论铁甲船备患》 | 1878 年 8 月 2 日 | 新闻评论 |
| 《日储谢世》 | 1878 年 8 月 7 日 | 日本内政 |
| 《日主出巡》 | 1878 年 10 月 14 日 | 日本内政 |
| 《东瀛杂录》 | 1878 年 11 月 16 日 | 日本内政 |
| 《译德皇孙抵日情形》 | 1879 年 6 月 14 日 | 日本外交 |
| 《大兴土木》 | 1879 年 12 月 29 日 | 日本皇室 |
| 《天津纪要》 | 1885 年 7 月 8 日 | 天津时事 |

密楷度一词的出现，直接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中上层日语知识的增加。尽管 7 世纪时日本已经出现了“天皇”的名称，但它其实并没有沿用下去。自 13 世纪的顺德天皇以后，日本君主多使用“帝”、“内里”、“朝廷”等名号，“天皇”的称谓有所淡化，

^① 《琉球商人为台湾生番杀害》，《申报》，1872 年 11 月 15 日，第 4 页。

直到 1841 年光格上皇去世后被授予“光格天皇”的谥号，这一称号才得以复活。明治前期，天皇尚被称为“皇帝”、“国帝”等，直到明治国家体制稳定后，“天皇”、“天皇陛下”的称呼才固定下来。^①而近代日本的对外交往正是始于这一“以称帝为主、由帝向天皇过渡”的阶段，因此，至今西文中尚以日语“帝”之音译 Mikado 一词称呼日本天皇。音译词密楷度的出现，反映出当时参与《申报》编辑的人士已对日语有所了解的情况。在传统的天下秩序中，汉字及依附于其表达的古代汉语几乎是东亚世界国际通用的语言文字，在各国的交往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即使是日文词汇也多可以用汉字来表达。而密楷度一词的出现表明，随着明治维新的日见成效，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出现了更多的日语学习者，他们在以汉字、汉语作为唯一信息交互方式的传统路径之外，开拓出以日语读音为基准的音译模式。相比于同在这一阶段被使用的其他日本君主称谓词，如日主或日皇，密楷度的表达彰显出对过往以汉字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一种回避，从文化层面预示了近代东亚国际格局“日升中降”的走向。

在以密楷度称呼日本君主的文本中，后来在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维新思潮亦略见端倪。由表 1 可以看出，《申报》中使用密楷度一词的报道凸显出关注政治的倾向。在这些报道中，无论是新购铁甲船时密楷度的“亲临巡阅”^②，还是其“巡行国境”时“乘舆所至，万姓欢迎”的景象^③，无不体现出当时日本上下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这与当时中国统治者深居宫禁、礼法森严的形象产生了鲜明对比。新闻评论《论铁甲船备患》直言，“日本殆有远大之见，故竭民之力、罄国之财而汲汲焉，以有铁甲船为幸也。而中国则虑不及此，上下行事犹大半固执古法，拘守成规，物极而不知所返，事败而不图其成，徒诩诩然以行王道、存大体……假令一旦遇有兵事，何者足以抵御哉？”^④尽管该文所论仍以“器物”为重点，但其认识已然在于更为深刻的社会困境。随着更多国人把目光转向东邻日本，一些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问题不但在于军事实力的羸弱，更在于政治制度的落后，这成为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维新派的先导。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之一王韬正是在 1879 年踏上了赴日考察的旅途，尽管此时他仍持“善为治者，不必尽与西法同”^⑤的认识，但在日的所见所闻无疑使他对维新变法有了更加直观的认知，进而促动了早期维新思潮的发生。

①刘金才：《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日本学刊》，2010 年第 1 期，第 143-154 页。

②《日本验船》，《申报》，1878 年 7 月 30 日，第 2 页。

③《日主出巡》，《申报》，1878 年 10 月 14 日，第 2 页。

④《论铁甲船备患》，《申报》，1878 年 8 月 2 日，第 1 页。

⑤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32 页。

总的来看，密楷度的称谓在《申报》中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传统东亚天下秩序格局的逐渐瓦解，传递出近代中国主张政治改良的维新思潮的历史先声，为我们了解彼时的中日交往与社会变化提供了一扇视窗。

二、“倭主”：甲午中日战争与天下秩序的瓦解

明治前期日本的初步对外扩张尝试逐渐使东亚传统天下秩序内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制陷于崩溃。在传统东亚国际体系中一直处于游离边缘位置的日本，很早便试图构建起一种以自身与中国并列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近代以后这种契机终于随着强盛西方的出现而到来。^①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便不断增强对琉球事务的干预，阻止其为中国纳贡，并最终于1879年吞并琉球；1884年甲申政变后《中日天津条约》的签订则使日本在朝鲜获得了与中国对等的外交地位，标志着中国再也无力对其藩属朝鲜施加单方面影响。^②然而，日本并不满足或止步于此，对东亚强权的渴望使其沉沦于对外扩张的迷思，甲午战争也因此成为历史的必然。

甲午战争爆发后，“倭主”迅速成为《申报》对日君主称谓中的一个常用词。“倭”本是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呼，后逐渐具有了蔑称的色彩，“倭寇”、“倭奴”等词莫不如是。1894年9月黄海海战之际，“倭主”一词首次见诸《申报》；其后战争期间，该词几乎成为《申报》最常使用的对日君主称谓，“倭国”、“倭寇”与“倭奴”在这一阶段也成为《申报》中日本与日本人的代称；《马关条约》订立后，该词又迅速消失。甲午战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秩序彻底瓦解，日本逐渐在东亚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并随着后来日俄战争的胜利得到进一步巩固。《申报》对倭主一词的使用，从本质上体现出传统天下秩序瓦解之际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沉痛的历史蜕变。王柯在分析清末“新疆建省”的意义时曾指出，“新疆建省”标志着清王朝放弃基于多元型天下体制和多元型帝国构造思想的“藩部”制度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放弃追求天下国家形式和传统帝国思想的开始。^③如果说“新疆建省”是清政府在“塞防”思想引导下进行多民族近代国家内部建设的一种主动、积极的尝试，那十年后的甲午战争或许正是因李鸿章主张的“海防”思想的缺失而被迫接受的外部后果。结合战争期间日军在旅顺“恣情残暴”的屠杀行径来看^④，甲午之际“倭主”的使用，正是当时身处历史巨变中的中国挥手作别千百年“天朝上国”地位时的不甘与耻辱、民族意识因忧愤而觉醒的真实写照。

①谢桂娟：《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多重内涵》，《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50-57页。

②刘琳琳编著：《日本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③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0页。

④《论倭奴残暴》，《申报》，1894年12月5日，第1版。

《申报》上倭主一词的“暴起骤落”，与当时中国官方层面对日本君主的称呼彻底改变的现实不无关联。甲午战争以前，中日签订和约多不书双方君主名号以免额外争端，但《马关条约》文起便将“大清帝国大皇帝”与“大日本帝国大皇帝”并列，两个“皇帝”标志着“天朝”最终从“名存实亡”走向了“名实皆亡”。^①或许正是由于官方称呼的剧变，1895年5月之后直至1949年停刊，倭主一词再也没有出现在《申报》上。然于名号之外，甲午之败本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思考才应当是更为深刻的因素——纵然《申报》可以在战争关头用倭主一词来传达“天朝”最后的愤怒，《马关条约》的耻辱与压迫却是痛定思痛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正如陈旭麓所言，“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但是，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它促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②当“天朝上国”败于“区区岛国”^③而被迫割地赔款时，再多重复的“倭主”也无法使中国人麻木于过往而不思存亡绝续的新路了。除此之外，在近代中国，倭主在官方政治中似乎只是帝国时代残存的印记，但对于许多个体的中国人来说，它却在私人笔触下与曲折而屈辱的现实如影随形。《申报》甲午前后对倭主一词的使用正可以理解为特定条件下大众政治话语通过公共舆论进行的表达，进而成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舆论乃至“国民外交”的先例。

①参见冯佳卉：《简论近代条约中日本的国号和元首称号——1853年到1895年》（日文），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年。

②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

③《论倭人谋甚狡而力不足》，《申报》，1895年4月19日，第1版。



图 1 《申报》1894 年 12 月 5 日报道《论倭奴残暴》中可见“倭主”一词

甲午时期《申报》中的“倭主”见证了“天朝”最终的崩溃，也传达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至此，传统东亚国际格局的“天下秩序”彻底瓦解，日本国内上上下下的大国意识由此大为膨胀，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变本加厉进行侵略扩张，中国则不得不在新的背景下继续救国救民的艰辛探索。

三、“日皇”：“走出天下”后的中日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

日皇是《申报》历时最久、使用最广的日本君主称谓。顾名思义，所谓日皇即指“日本皇帝”或“日本天皇”。颇为有趣的是，《申报》最早使用日皇一词，实为代指“日耳曼皇帝”即德国君主，如 1878 年记述“日耳曼皇被刺客开枪打伤”一事的《德国近信》即见“日皇”这一简称，但这种用法极为少见，大部分时间仍用德皇一词。^①1879 年 5 月 24 日《申报》的《琉世子到日续文》一文是最早使用日皇一词的新闻报道。^②19 世纪 80 年代，该词与密楷度、日本国王等并用，1895 年《马关条约》订立以后，该词逐渐成为《申报》对日本君主的主要称谓，尽管间有“日帝”等称呼，但无疑以日皇最为常用。

1911 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告别帝制时代，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往避讳称日本君主为皇帝的制度因素不复存在，“日皇”反而促使走入民国的中国人加深了对“民主共和”的体认。传统东亚世界的天下秩序基于“华夷有别”的族群观念，又

① 《德国近信》，《申报》，1878 年 8 月 6 日，第 2 页。
② 《琉世子到日续文》，《申报》，1879 年 5 月 24 日，第 2 页。

以“朝贡-册封”为其形式，但君主制实则是其不可忽略的底色。中国皇帝的“天子”身份，既在其政权之内具有权威，亦在对外交往中被普遍认可，而这种政治制度与文明逻辑又被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效仿。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天下”具有双重的内涵：一是各政权内部以各自君主为“天”的君主制度，二是国际关系中以中国皇帝和中国为“天”的政治秩序。尽管历史上日本长期远离东亚政治权力中心，但其受到这一秩序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的。如果说甲午战争使东亚的国际秩序走出了天下，那辛亥革命则使这一秩序过去的“中心”中国在内部也脱离了天下。然而，“日皇”却提醒世人，日本尚未走出天下。对内，伴随君主政治传统的延续，日本仍是一种“天下”的世界；对外，日本在观念上仍然沿袭着传统的东亚国家政治理念，并试图通过军事扩张构筑起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体系。^①

民国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在这一过程中，尽管《申报》对日本君主保持着“日皇”的措辞，但同时“倭寇”的使用却与前者形成了鲜明对比，进而营造了一个特殊的话语空间。李玉的研究发现，华北危机与抗战初期是《申报》使用“倭寇”一词频率最高的时段。尽管国人附着在“倭寇”之上的情感一直是仇恨与愤怒，但从长时段来看，“倭寇”背后的意象经历了由甲午战争时期的“忧愤”过渡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激愤”的转变，并在抗战烽火逐渐燎原的过程中汇入全民族对日怒吼的大潮中。^②在军国主义盛行、忠君思潮狂热的昭和前期，相比于“倭寇”，对日本天皇的蔑称甚至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政治争端，进而激怒日本社会的战争热情，《申报》常用“倭寇”却不以“倭主”取代“日皇”，或许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一种特别考量。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本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孤岛”中坚持抗日爱国宣传的《申报》完全陷落，由日本军方接管续办，直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可谓是历史上《申报》最为屈辱的一页。^③此时的《申报》对日君主称谓仍用日皇一词，但舆论导向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竭力塑造“大东亚共荣圈”话语下日本天皇的积极形象。抗战时期日本对沦陷区的统治模式以扶植傀儡政权为核心，中国报刊多仍以一般外国君主报道日本天皇，“日皇”的称呼在表面上似乎遮掩了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但鼓吹战争、追捧日皇却暴露出侵略奴化的本质。1945年抗战胜利后，《申报》被国民政府接收。此后的《申报》虽仍用日皇一词，但表现出多直呼其名的新特点，而在此之

①姚锦祥：《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历史演变》，李扬帆主编：《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②李玉：《近代中国对日怒称“倭寇”的历史考察——以〈申报〉为中心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131-138页。

③马光仁：《抗战时期的〈申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210-228页。

前《申报》鲜有对日本君主直呼其名的例子。^①1945年至1949年，《申报》直呼裕仁其名的报道近400余篇，直观展现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舆论对酿成战争却不负罪责的“恬不知耻”^②的日本君主的不屑态度，也从侧面反映了二战后日本天皇“不再赋有神性”^③的转变。



图2 《申报》1947年5月7日报道《日皇晋謁麦帅》中可见“裕仁”称呼

在某种程度上，日皇的称呼是“走出天下”后近代国家体制下中日关系的一种反映，但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日皇”仍然体现出不同的色彩。时至今日，中国香港等地区媒体依然沿用日皇一词，独具一抹近代历史的回响与遐思。

四、 走不出的天下：东亚视域下的日本近代化省思

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中国，近代东亚国际秩序中的日本似乎始终都未能走出天下。走不出天下的背后，实则是日本近代化历程中“近代性”的缺失与错位。

在日本国内政治中，明治维新确立的近代天皇制使日本始终无法脱离君主政治传统的局限，从而陷入“越近代越专制”的怪圈，体现了“近代性”的缺失。在近代日本天皇制立宪主义的政治原则与制度设计下，尽管君主在集权的同时仍有亲政主动性受到限制的可能，但天皇亲政与公议（扩大政治参与）无疑成为最主要的倾向。^④与此同时，日本逐渐因其军国主义基本国策而发展出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在对外武力扩张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⑤《申报》从帝（密楷度）到皇的称谓转变，也在

①笔者找到的只有1939年3月22日《不愿将国运孤注一掷 监理国政打破皇室先例》一文中有“日本裕仁天皇”的用法，彼时中日业已开战，《申报》此文亦对裕仁干政颇具讥讽之意，见《申报》，1939年3月22日，第6版。

②《社论·太平洋战争四周年》，《申报》，1945年12月8日，第1版。

③《张群播讲日本观感》，《申报》，1948年9月29日，第2版。

④张东：《天皇制立宪主义——传统的发明、断裂与延续》，《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第8-13页。

⑤娄贵书：《日本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的三大支柱》，《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0-130页。

定程度上体现出这种特征。由此可见，近代日本的天皇制并不具备价值更新和社会革命层面上的近代性，其内核仍是非近代的。^①

在东亚国际格局中，传统的天下秩序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动力，使日本妄图通过军事扩张实现“天下”的近代再现与复归，彰显了“近代性”的错位。在理论上，无论是思想史上的“亚洲主义”，还是学术史上的“东洋史观”，近代日本的思想观念似乎从未跳脱“天下”色彩的桎梏；^②而在实践上，二战中日本的占领区域与传统“封贡体系”空间的不谋而合，体现出其对中华帝国的刻意追求与取而代之行动，这“在形式上反射出其与中国区域关系框架间的同构特质，只是这种同构是一种‘置换了文明内核’后的同构，是以‘武威华夷秩序’代替‘礼乐华夷秩序’、把‘天下大同’理想变‘天下占领’后的同构”。^③然而，在东亚格局已经进入近代式国际关系的 20 世纪，日本从传统的“日本式华夷秩序”出发，试图通过“大东亚共荣圈”实现“天下”的近代复现，^④无疑是对已经处于近代化国际关系中的东亚格局的强行扭曲，进而暴露出一种近代性的错位。

回顾历史，近代东亚国际格局的嬗变无疑是逐渐走出传统天下秩序、进入近代国家体制的过程，而此过程中日本“近代性”的缺失与错位值得世人省思。对于二战后日本政府及部分学者基于象征天皇制所作的“国体未改”的阐释及其背后隐含的军国主义色彩，^⑤我们仍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①韩东育：《从近代化到近代性：日本新旧宪法的思想史解读》，《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142-162页。

②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③韩东育：《关于近现代中日关系本质的再审查》，《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第27-33页。

④王铭：《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转型逻辑》，《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49-179页。

⑤李超：《宪法视域下天皇与日本国体的关系》，《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27-37页。

参考文献

- [1] 《琉球商人为台湾生番杀害》，《申报》，1872年11月15日，第4页。
- [2] 《日本验船》，《申报》，1878年7月30日，第2页。
- [3] 《论铁甲船备患》，《申报》，1878年8月2日，第1页。
- [4] 《德国近信》，《申报》，1878年8月6日，第2页。
- [5] 《日主出巡》，《申报》，1878年10月14日，第2页。
- [6] 《琉世子到日续文》，《申报》，1879年5月24日，第2页。
- [7] 《论倭奴残暴》，《申报》，1894年12月5日，第1版。
- [8] 《论倭人谋甚狡而力不足》，《申报》，1895年4月19日，第1版。
- [9] 《不愿将国运作孤注一掷监理国政打破皇室先例》，《申报》，1939年3月22日，第6版。
- [10] 《社论·太平洋战争四周年》，《申报》，1945年12月8日，第1版。
- [11] 《张群播讲日本观感》，《申报》，1948年9月29日，第2版。
- [12] 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2页。
- [13] 祝敏彻等：《诗经译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78页。
- [14] 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 [15]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4页。
- [16]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 [17] 刘琳琳编著：《日本概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2页。
- [18] 李扬帆主编：《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 [19] 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50页。
- [20] 马光仁：《抗战时期的〈申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第210-228页。
- [21] 高宝兴：《日本天皇的称谓》，《日语知识》，2003年第11期，第38页。
- [22] 刘金才：《近代天皇观与日本“历史认识”的解构——读安丸良夫〈近代天皇观的形成〉》，《日本学刊》，2010年第1期，第143-154页。

- [23] 李玉：《近代中国对日怒称“倭寇”的历史考察——以〈申报〉为中心的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第131-138页。
- [24] 王铭：《近代“日本式华夷秩序”的转型逻辑》，《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1期，第149-179页。
- [25] 谢桂娟：《传统东亚国际秩序的多重内涵》，《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50-57页。
- [26] 张东：《天皇制立宪主义——传统的发明、断裂与延续》，《日本问题研究》2016年第6期，第8-13页。
- [27] 娄贵书：《日本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体制的三大支柱》，《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20-130页。
- [28] 李超：《宪法视域下天皇与日本国体的关系》，《日本问题研究》，2021年第5期，第27-37页。
- [29] 韩东育：《从近代化到近代性：日本新旧宪法的思想史解读》，《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第142-162页。
- [30] 韩东育：《关于近现代中日关系本质的再审查》，《近代史研究》2023年第5期，第27-33页。
- [31] 冯佳卉：《简论近代条约中日本的国号和元首称号——1853年到1895年》（日文），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7年。